

12|跨学科研究

经济学应用于语言：方法与路径

□弗兰西斯·格林



■ 弗兰西斯·格林 (Francois Grin) 瑞士日内瓦大学翻译学院经济学教授;日内瓦大学语言、培训与经济观测中心主任。

语言经济学是处于经济学边缘的一种研究领域，有较强的跨学科性质。这一界定的前提是区别“经济”和“经济学”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经济”，指的是人类的一项活动。“经济学”则指的是分析人类行为的一种方式。这一概念可以应用于对各类主题的分析，这些主题既包括典型的经济变量（如价格、收入、利率）或经济过程（基本为：生产、消费和交换等），也包括其他诸如教育、健康、环境和语言等各类主题。

本文目的是对语言中的经济分析进行概述性介绍，尤以探讨不同经济话语应用于“区域和少数民族语言状况研究”以及“旨在改善这些语言状况的语言政策的选择和设计”的功能为重。

语言经济学领域的构建方法

语言经济学领域的构建将涉及两组方法。第一组方法聚焦于语言变量($\{L\}$)对经济变量($\{E\}$)的影响，我们用符号($\{L\} \rightarrow \{E\}$)来表示。在这组研究中，经济变量由于因变量的位置。换言之，经济变量才是我们要解释的对象，如人们的语言技能对他们的劳动收入产生的影响这一类话题。第二组方法聚焦于两者相互因果规律，其中，我们寻求对语言变量的合理解释，如人们的语言行为是怎样对外界条件的转变（比如国际贸易类型的变化）作出反应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一组研究中所涉及的自变量或“解释性”变量不仅仅局限于标准的“经济”变量的范畴（如国际贸易的类型、相对价格或收入等）。因此，它们中不仅会产生($\{E\} \rightarrow \{L\}$)的类型，解释性变量也有可能包含非经济的因素，即($\{V\}$)，其中一个关键是这些变量对语言变量的影响方式必须在经济学上有意义。换言之，我们可以称之为“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用($\{V\} \rightarrow \{L\}$) E 的符号来表示此类研究。

第一组($\{L\} \rightarrow \{E\}$)的方法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应用于语言政策。特别地，它将有助于确认那些为保护和改进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RMLs)而设计的政策的经济效应。如果结果显示为积极（即对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改进能显示

一种“约束条件下效用最大化”的体现，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受到一系列的有形（如物质的和财政的）或无形的约束下，最大限度地谋求自己的福利（其评价标准不仅来自物质和财政方面，还有一些社会和文化的因素）。

为语言政策提供最好分析方法

以上方法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严格分析框架，这使位于高端的语言政策决策自上而下与处于低端的政策执行结果（如分时段来测定的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总体使用情况的变化）结合起来。这样，建立在“约束”和“效用”（或“目标”、“满足”）出于分析的需要，这几个概念的所指基本相同）之上的核心模型就可以用更接近社会语言学的概念来重新表述，即用C(Capacity)表示使用一种语言的能力”，O(Opportunity)表示使用这种语言的“机会”，D(Desire)表示驱使这一行为的“意愿”。其中，能力是通过语言教育实施发展起来的，机会则是通过更适用更方便的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服务而产生或增加的，这些服务降低了使用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去从事活动的

相对成本；而意愿（绝大部分上与对语言和语言使用的态度是一致的）则借由对语言的形象和合法性（既包括该语言使用者，也包括不使用该语言的其他人群对这一语言的看法）的强化措施得以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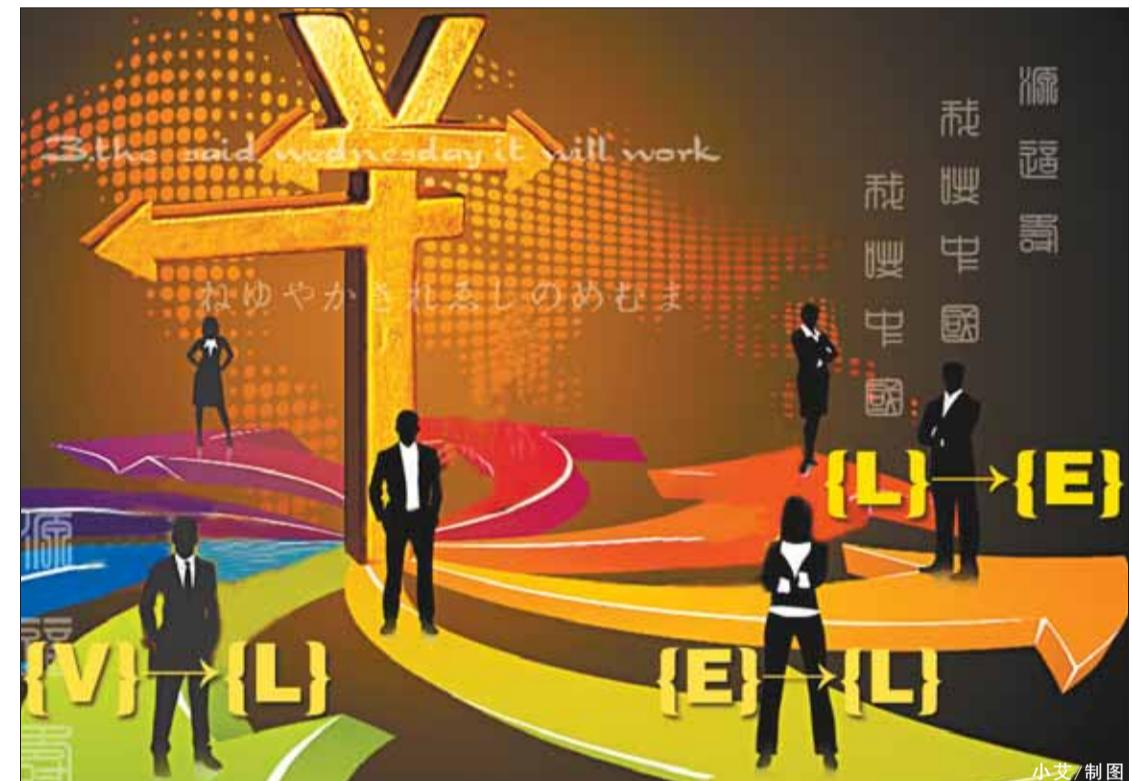
上述所有因素都包含在一个从政策到结果的路径 (policy-to-outcome path, P-TOP) 中，这一视角将关注的焦点投向了语言政策的有效性。P-TOP 可以理解为一种精心设计的通用工具，它发源于特定领域的特质的社会语言学事例中。不过也因此，P-TOP 的发展或许更关注细节，而其他因素则暂时搁置。然而，对普遍性和一致性的关注仍然是这一语言政策分析方法的核心之一。

语言经济学，不论是上面提到的($\{L\} \rightarrow \{E\}$)、($\{E\} \rightarrow \{L\}$)或($\{V\} \rightarrow \{L\}$) E 哪种类型，都为语言政策的事前筛选和设计、事后评价提供最快最好的分析方法。当然，要想正确的使用这一分析模式，社会语言学的相关概念和专门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说，语言经济学在跨学科的语言政策研究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尹蔚/译，译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出对标准的经济变量有积极影响），这或许能有助于说服那些原本反对既定语言政策的社会成员（包括媒体人和政治家）去支持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

对那些旨在促进濒危的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语言政策来说，在它们的选择和设计上，第二组方法（包括($\{E\} \rightarrow \{L\}$)和($\{V\} \rightarrow \{L\}$) E 两种类型）具有实用价值。依照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可以假定社会成员（包括那些能同时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或主流语言的双语者）的行为是



小艾/制图

博弈论和演化论拓宽传统语言学研究视野

□姜国权

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语言转向”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学科开始产生相互联系、紧密结合以及相互融合的现象，进而产生了语言逻辑学与逻辑语言学、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学等与语言学相关的交叉学科。1965年由美国经济学家Jacob Marschak在Behavioral 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语言的经济学》的论文中最先提出了语言经济学的概念。按照Grin的观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体系是围绕着传统“经济变量”和相关问题。其后，许多经济学家和语言学家都尝试使用不同的语言来描述语言经济学，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语言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一种范式，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来研究语言的一门交叉学科，或者说语言经济学是用经济学方法所研究的语言问题。

Rubinstein指出，“如果博弈论要解释现实生活的现象，那么，语言现象就是最有前途的候选人了。”“在用以解释语言现象时，博弈论工具可能最为有效。”这是因为，在Rubinstein看来，博弈论不仅能解释符合“合作原则”的现象，还能对“辩论”这个不符合“合作原则”的现象提供解释——“这就是给定辩论的长度和辩论者的兴趣，那么，说服原则试图创造一个环境，使得最好地引发信息成为可能。”Rubinstein使用博弈论来解释“合作原则”及他所提出的对“合作原则”作为补充的“说服原则”的研究方法，为研究“合作原则”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也证明了用博弈论工具来解释语言现象的有效性。

数理逻辑法则
解释语言经济原则具有可行性

Zipf最早提出了“省力原则”，在此基础上，Martinet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原则”。经济原则“可以概括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这是指导人类行为的一条根本性原则”。Martinet(1962)和Zipf(1962)都认为，为实现交际而付出的努力总是跟所传递的信息量成正比的，这是存在于语言经济现象中的一条基

本原则。在经济学中，“经济”意味着以尽可能小的投入去获取最大的收益。但是，语言学家提出的“省力原则”与“经济原则”中的“经济”和“省力”与经济学中的“经济”有着不同的含义。语言学中的“经济”并不是指说的话越少越好，而是相对于知情代理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其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知情代理人采取了一个旨在影响听者的后续行动的行动（不一定是话语），它与博弈论的相似之处是很明显的。”由此可见，博弈论与“合作原则”在本质上存在着相似性，因此可以借用博弈论来对“合作原则”进行研究。

Rubinstein指出，“如果博弈论要解释现实生活的现象，那么，语言现象就是最有前途的候选人了。”“在用以解释语言现象时，博弈论工具可能最为有效。”这是因为，在Rubinstein看来，博弈论不仅能解释符合“合作原则”的现象，还能对“辩论”这个不符合“合作原则”的现象提供解释——“这就是给定辩论的长度和辩论者的兴趣，那么，说服原则试图创造一个环境，使得最好地引发信息成为可能。”Rubinstein使用博弈论来解释“合作原则”及他所提出的对“合作原则”作为补充的“说服原则”的研究方法，为研究“合作原则”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也证明了用博弈论工具来解释语言现象的有效性。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

语言的经济学、经济语言学与经济学的修辞 ——“语言经济学”语源考辨

□张卫国

事语言问题研究时至少不把社会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排除在分析范围以外的一种社会语言学。此外，“经济语言学”与“语言的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高度相关，甚至某些观点是一致的，只不过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前者主要从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后者则更加侧重于经济学的视角。

至于经济学的修辞，它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方法论而出现的针对经济学语言所进行的修辞研究。其代表人物是D.N.McCloskey。许多人（如Grin）认为，经济学的修辞与语言的经济学不同，前者成果在于分析经济话语和经济学家语言的运用，因而不属于后者的范畴。客观地说，它们二者间的区别的确很大，不能因为它们都涉及了经济学又涉及了语言，就把二者生硬地归为一类，但如果二者没有联系也不确切。Rubinstein曾指出，语言和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之一是经济理论与语言问题的相关性。经济学的修辞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待经济理论，自然是一个与“经济理论与语言问题二者相关性”有关的研究主题。McCloskey更是援引莱昂内尔·罗宾斯的经典经济学定义认为，“修辞是语言的经济学，它研究如何在人们无法满足的倾听欲望之间分配稀缺手段。”可见，经济学的修辞也至少和语言经济学研究保持着某种联系。

从广义与狭义加以区分

“经济学与语言”与其说是一个称谓，不如说是一个较宽泛的研究领域。Willie Henderson等人1993年在题为《经济学与语言》的文集里，收集了许多关于经济学修辞的文献；Rubinstein在2000年也出版过同名的文集。Rubinstein首先使用标准的经济模型讨论了语义性质选择、演化策略对语言意义的影响、语用学中的策略等问题，然后讨论了决策与语言以及博弈论的修辞问题。可以看出，Rubinstein之所以选择“经济学与语言”为题，一是因为文集中的讨论不仅涉及语言的语义、语用及演化问题本身，还对经济学语言进行了反思。文集分别使用了“语言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语言”两个篇名对两类问题进行了区分；二是因为书中内容和传统的语言经济学研究没有必然联系。Rubinstein坦言，尽管是相同的标题，但Grin等人的研究和他所表达的兴趣相去甚远。同时，Rubinstein又强调，文集虽然涉及了几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却没有涉及“经济学与语言”这一标题下可能包含的全部问题，譬如Grin等人的研究内容就被忽视了，这也就是说，在Rubinstein看来，“经济学与语言”的研究范围要大于“语言的经济学”。

不过，在这一问题上，Grin的观点恰好相反。受贝克尔观点的启发，Grin曾对“语言的经济学”的定义进行了补充：由于经济学的特点不在于它研究的话题，而在于研究问题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经济学论证推理方法应用到语言问题也是‘语言的经济学’的一部分”。语言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题目，包含的内容非常宽泛，自然在它之下的具体研究方向会有很大不同。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便有了不同的理解或感受。作为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Marschak是在研究信息经济学的过程中提出了对语言效率及其优化的经济学思考；Grin等人是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探讨语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Rubinstein是用规范的经济学方法分析了语言结构及其生成演化问题。

经济语言学与经济学的修辞

经济语言学是语言学界提出的一个概念。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撰文称他们受“语言的经济学”一词启发而提出了“经济语言学”，并将它与经济学的修辞相联系，认为经济语言学是从修辞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学的语言。

首先，国内学者存在着对“经济语言学”语义渊源的一个误读。早在199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语言学教授John Baugh在《经济语言学理论的维度》(Dimensions of a Theory of Econolinguistics)一文中就对经济语言学下过一个简单的定义，即经济语言学是“语言实证研究的一个领域，它求证两类曾被（语言学）所忽视的语言普遍性，一是语言行为，包括说和读，都是经济商品，语言的驾驭能力对个人的经济前景有直接影响；二是语言的发展变化本质上是由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的”。此后，日本社会语言学教授井上史雄(Fumio Inoue)在从事相关研究时一直使用了“经济语言学”一词。

其次，国内学者也误读了经济语言学的真实内涵。John Baugh教授明确指出，提出“经济语言学”的主要动机来自他对传统社会语言学解释力度的不满，进而有必要进行一种新的社会语言学的“诊断”方法。也就是说，经济语言学并非像国内一些学者所理解的那样，是研究经济学语言的语言学，而是指在从

综合上述分析，语言经济学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语言经济学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语言本体（包括它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或者研究经济现象、经济关系与语言及言语行为的相关性。狭义的语言经济学可以理解为广义语言经济学之下具体研究领域或分支的深入。相对而言，本文前面所辨析的几种称谓都属于狭义的语言经济学。借鉴法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的做法，广义的语言经济学对应的英文可以用Language and Economics一词，其汉语称谓可以直译为“语言与经济学”（尊重学界习惯，简称“语言经济学”）。一来以示和“经济学与语言”的区分，二来它似乎更具有包容性。已有纷杂的、以问题为导向的，或与语言经济学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那些相关研究（如经济学的修辞），便都可以统一在广义的语言经济学这一标题之下。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语言经济学研究所）